

# 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 互动关联机理研究\*

苏岚岚 孔 荣

**摘要：**基于系统梳理金融素养理论研究演进动态，本文遵循“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促进农民要素市场参与—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理论逻辑，阐释了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整合的互动关联系统，并剖析了其局部及整体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农民以要素需求者和供给者双重身份参与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充分流动和单一要素市场的发育。研究进一步表明，以农民金融素养为纽带可有效激活农村“人动—地动—钱动”的要素市场互动关联系统，使农民金融素养在要素流动实践中得以持续提升，同时不断生成要素流动新的循环，最终加快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均衡匹配发展和整合发育。

**关键词：**农民金融素养 农村要素市场 互动关联机理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要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市场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劳动力市场看，“大众创业”战略推动下，截至2018年5月，全国有累计接近500万农民工参与返乡创业大潮，约占农民工总数的2%<sup>①</sup>，农民创业群体逐步发展壮大，自主创业成为农民实现自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选择；从土地市场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呈现不可阻挡的趋势，截至2017年6月，全国2.3亿承包农户中近30%农户已全部

---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金融行为中介作用下农民金融素养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71773094）、“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农村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项目编号：71373205）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孔荣。

<sup>①</sup>资料来源：《让返乡创业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标本》，[http://epaper.oceee.com/epaper/A/html/2018-05/07/content\\_25384.htm#article](http://epaper.oceee.com/epaper/A/html/2018-05/07/content_25384.htm#article)。

或部分地将承包地转出，流转承包地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36.5%<sup>①</sup>，农民农地产权交易行为日益多样化；从资本市场看，农村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加至 30.95 万亿元，十年间平均增速约 18%，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从 22%提高至 25%<sup>②</sup>。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均衡匹配对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农村发展动能转换、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农民创业发生率整体较低、非农就业转移质量偏低等问题；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中存在土地流转总体规模较小、流转效率低、有效需求不足、政策驱动力度强而市场拉动作用弱等问题；资本市场中存在着部分金融机构闲置大量资金、缺乏优质客户与农民有效金融需求不足、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存等问题。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不单需要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简单流动，更依赖于多重要素市场的整合发育（朱文珏、罗必良，2016）。然而，政策实践多基于供给层面谋求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单一要素市场的发展，对各要素市场间的互动关联关系重视不够，比较缺乏将三大要素市场置于同一政策设计和执行框架，从需求侧出发系统审视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及整合。当前，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探究如何从需求侧发力，撬动农民自身的能动性因素，增强农民参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的积极性和参与能力，成为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培育壮大农村发展新动能、有力支持农村要素市场供给侧改革的迫切需要。

理论界围绕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单一要素市场发育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作了大量实证探讨，为谋求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提供理论基础和诸多有益启发。一是在农村要素市场化水平测度及各要素市场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方面，相关研究分别针对性构建劳动力（许恒周，2011）、土地（许恒周、金晶，2011）、资本（刘西川等，2014）等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测度指标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明显滞后于劳动力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育则更为滞后（侯明利，2013）。二是在农民要素配置行为视角下农村各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研究多将个体单一要素市场参与行为视为相对独立的选择，并基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环境特征及政策因素等方面探讨单一要素流动的制约因素；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逐渐将两类不同要素流动决策的内在关联性纳入研究框架，如诸多研究围绕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许恒周，2011；陈飞、翟伟娟，2015）、土地流转与信贷市场（张龙耀等，2015；许泉等，2016）、劳动力市场与信贷市场（米运生等，2017；刘雨松、钱文荣，2018）之间的关联性作了大量探索，但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另有学者基于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机制，揭示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胡新艳等，2017）。可见，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机制及其路径研究已成为当前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研究的重要方面。

随着国内金融素养研究的兴起，农民金融素养及其对农民理性经济决策的影响成为农村需求侧研

<sup>①</sup>资料来源：《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http://szb.farmer.com.cn/nmrb/html/2018-02/05/nw.D110000nmrb\\_20180205\\_3-06.htm?div=-1](http://szb.farmer.com.cn/nmrb/html/2018-02/05/nw.D110000nmrb_20180205_3-06.htm?div=-1)。

<sup>②</sup>资料来源：《银监会加大 2018 年考核力度，明确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目标》，[http://epaper.zqrb.cn/html/2018-03/20/content\\_262681.htm](http://epaper.zqrb.cn/html/2018-03/20/content_262681.htm)。

究的热点话题，亦为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研究提供一个崭新视角。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深入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参与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过程中，农民在交易对象选择、交易方式确定、交易合同签订等决策环节均不可避免会涉及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衡量与比较，因此，金融素养对农民生产要素市场的理性参与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基于全国9个省份5400个消费者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金融知识严重缺乏，且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更为缺乏，金融风险责任意识薄弱、家庭支出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也较为突出<sup>①</sup>。金融素养水平低不仅会抑制农民有效金融需求、降低其金融可得性，阻碍以农地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代表的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而且会制约农民对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理性配置决策。随着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农民在各要素市场的参与行为逐渐从非市场化转向市场化，从依赖人情关系转向依赖成本、收益及风险的理性衡量，这对农民的财务计算能力、资金配置能力、家庭收支规划能力和投资理财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因而，针对农民金融素养与其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参与及各要素市场发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与总结农民金融素养相关研究动态基础上，试图将金融素养纳入农民要素市场参与决策及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研究框架，遵循“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促进农民要素市场参与—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理论逻辑，探究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内在关联机理，以期拓展金融素养研究的学术视域，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及整合提供理论参考。

## 二、农民金融素养研究动态追踪及评述

### （一）农民金融素养内涵及其测度研究的发展

金融素养概念最早由 Noctor et al. (1992) 提出，并被界定为个体在配置和管理财富方面所具有的 实施理性评估和高效金融决策的能力。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形成三个层面各有侧重的金融素养定义：“理论定义”认为具备金融素养的人应熟悉基本的经济原理和有关经济知识 (Cutler and Devlin, 1996)；“应用定义”强调个人具有理解并应用金融概念的能力 (Servon, 2008)；“意识定义”则突出意识性，强调个人所具有的搜寻和处理金融决策所需相关信息并预见可能的经济后果的能力 (Mason and Wilson, 2000)。金融素养测度最早聚焦于大学生、城市居民等群体，为农民金融素养水平评估提供诸多有益借鉴。Chen and Volpe (1998) 通过受访大学生对与个人理财相关问题的回答发现，美国大学生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Huston (2010) 基于文献统计发现，金融素养测度至少应包括金融基本理念、借贷、投资和风险预防四个方面，且前三个方面在已有研究中的覆盖率较高。尹志超等 (2014) 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对通货膨胀理解、利率计算及投资风险认知三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分别为 15.64%、14.90% 和 29.57%，问题均回答正确的家庭仅占 1.65%，表明中国

<sup>①</sup>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2016：《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2015》，<http://shanghai.pbc.gov.cn/fzhshanghai/113598/3053178/index.html>。

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整体偏低。张欢欢、熊学萍（2017）从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金融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农民金融素养测评体系，并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研究结论。金融素养测度方法包括主观和客观测度法，且对不同研究对象均具有一定适用性。主观测度基于调查对象对股票、债券等金融相关产品的熟悉程度而做自我评价（Anderson et al., 2017）；客观测度则依据受访者对多个问题以多项选择或判断正误的方式进行的回答结果，通过得分法或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尹志超等，2015）。

## （二）农民金融素养前因变量研究的推进

梳理文献可知，诸多学者基于个体、家庭和金融教育等方面挖掘导致金融素养水平差异的前置因素，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从个体因素方面看，部分研究表明男性相较于女性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例如 Lusardi et al., 2010），而2015年的《全球经济素养调查》显示，性别并非导致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差异的显著性因素<sup>①</sup>；年龄与金融素养呈倒U型关系（王宇焘、范洁，2015）；受教育程度（Lusardi et al., 2010）和风险偏好（Agarwal et al., 2015）均与个人金融素养呈正相关关系。从家庭因素方面看，许多学者认同个人收入与其金融素养水平正向相关（例如 Hastings and Mitchell, 2011），但亦有研究指出两者之间无显著关联（Agarwal et al., 2015）。另有研究认为学校金融教育和政府或金融机构等提供的金融培训均有助于提升个体金融素养水平（Walstad et al., 2010）。也有学者围绕农民金融素养影响因素开展了针对性探讨后发现：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非农程度、金融教育及培训等因素对农民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年人均收入无显著影响（张欢欢、熊学萍，2017）。

## （三）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研究的拓展

已有文献将金融素养引入家庭理财规划、资产配置、信贷、创业活动等家庭经济决策的研究中，相关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居民，并呈现向农村居民拓展的趋势。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素养提升能增进个体对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衡量和把握，降低其金融决策所产生的信息搜集和处理成本（Dohmen et al., 2010），缓解家庭金融排斥问题，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张号栋、尹志超，2016）。部分学者对农民金融素养与其金融行为尤其是信贷行为的关系关注较多，大量研究均证实，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家庭非正规信贷偏好（吴雨等，2016），促进家庭正规信贷获得（宋全云等，2017），并提高家庭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孙光林等，2017），减少过度借贷、逾期还款等行为的发生（Sevim et al., 2012）。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家庭创业尤其是主动型创业的概率，且上述影响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尹志超等，2015）。

部分针对城镇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关系的探究为拓展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提供重要启发。如在金融素养影响城市家庭理财规划和资产配置行为方面，相关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促进城市家庭理财规划选择，提升其理财规划时间跨度（胡振、臧日宏，2017），且有助于其在参与互联网金融理财过程中更好规避风险、创造增值收益（魏昭、宋全云，2016）。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可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种类（曾志耕等，2015），尤其是增加股票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配置比例（尹志超等，2014）。另有研究显示，金融素养的增加提高了城市居民购买商业

<sup>①</sup>资料来源：《超一半中国人不会计算储蓄收入》，<http://data.163.com/15/1206/22/BA6E0K0R00014MTN.html>。

保险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城乡家庭中无显著差异（秦芳等，2016）。随着金融素养结果变量的深入挖掘，部分学者将金融素养对个体及其家庭的福祉影响分析从经济行为本身进一步延伸至经济行为的结果。基于收入增长视角，王正位等（2016）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城市家庭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基于财富积累视角，吴雨等（2016）研究认为，金融知识可通过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家庭财富增长，并且金融知识的财富积累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

#### （四）农民金融素养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基于对金融素养尤其是农民金融素养理论研究演进过程的梳理，本文作出如下总结和思考。一是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的延伸：欧美国家金融素养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学者引入金融素养这一新视角解析中国相关问题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开展针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问题的研究，尤其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农民金融素养问题给予较多关注。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金融素养内涵研究不断丰富化，农民金融素养测度呈现本土化趋势，农民金融素养的前置变量研究尚未形成较一致的结论，农民金融素养的结果变量研究从聚焦一般金融行为本身拓展到对经济行为结果的关注，研究内容得以深化。三是研究的局限性：金融素养引致的福利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民金融素养及其结果变量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多关注农民金融素养对其资本市场参与的影响，而对农民金融素养在农村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且忽视了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层面拓展农民金融素养结果变量及其福利效应研究，深入阐释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并构建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互动关联的逻辑框架，以期推动金融素养理论在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和整合实践中的拓展性应用和创新性发展。

### 三、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单一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阐释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8年1月和3月分别赴陕西和宁夏开展主题为“农民金融素养、农村要素市场参与决策及其福利效应”的农村实地入户调查。陕西和宁夏均为西部农业大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突出，且均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农村各要素市场发育环境较好。调研采取典型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原则，选取陕西西安市高陵区、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和石嘴山市平罗县三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典型试点县（区）；同时，选取渭南市富平县、汉中市南郑县、中卫市沙坡头区等一般试点区域进行抽样。调查组在各县（区）选取3~4个反映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按照相同标准分层选取2~3个样本村（自然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15~20个样本农户（主要为家庭财务决策人）进行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5份，问卷有效率98.14%，共涉及6个市6个县（区）24个乡镇72个自然村。

农民兼具农村要素市场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双重身份，农村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处理好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必须重视农村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均衡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区域平衡和充分的发展。鉴于此，本文拟结合1325户

农户调研数据统计结果,分别阐释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单一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为将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系统探究农村要素市场培育奠定基础。

### (一)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基础,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雇佣是农民分别以劳动力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身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体现。依据劳动力就业的具体形式,可将其划分为工资雇佣型就业和自我雇佣型就业。鉴于农户本身是农民实现自就业的经济单元,自我雇佣型就业既包括维持原有规模的小农经营,也包括农业领域内规模经营和非农领域创业。不同就业选择所获取收入的类型、择业动机和期望效用不同。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政策特征、城市务工环境、务农机会成本等方面探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但忽视了劳动力自身金融素养对其就业选择及雇佣决策的影响,本文试图阐释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如图1所示)。

1.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理分析。依据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论可知,理性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要求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不同生计选择的成本、收益及经济风险等作出清晰的判断和衡量。金融素养高的个体往往表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农民对工资雇佣和自我雇佣的决策取决于不同形式就业选择所引致的家庭经济风险、就业选择成本、家庭收入稳定性和成长性等的综合比较。如果工资雇佣较自我雇佣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倾向于选择工资雇佣;反之,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倾向于采取自我雇佣的生计决策。农业和非农领域创业型就业是农民实现自我雇佣的较高形态。鉴于农民创业是包含投资、融资及风险管理等决策的系统性过程,投资方案的合理规划、融资渠道的高效选择、风险规避措施的及时采用等,均需创业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农民金融素养与其创业型就业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农民是否选择创业是基于对创业和不创业两种就业选择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的直接衡量,同时,创业作为一种风险投资形式,直接反映个体在风险资产(创业资本)与无风险资产间配置的结果。金融素养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资产配置决策,亦直接影响个体对创业与否的综合效用比较,因此,金融素养可直接影响农民创业型转移。另一方面,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其信贷知识更全面,融资意识更积极,对金融市场了解更充分,对自身金融市场参与能力持有较强信心,个体倾向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融资,缓解资金约束对创业选择的抑制作用;同时,风险规避意识强的个体对创业风险的感知较为敏锐,倾向于积极采取互助担保等金融合作形式和预防性储蓄等措施,防范创业风险,即金融素养间接影响农民创业型就业。因此,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促进其创业型就业,推动劳动力供给市场发育。

2.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雇佣的影响机理分析。雇佣劳动力是规避家庭经济活动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且创业农民比一般农民具有更强的雇佣劳动力需求。鉴于经营规模扩大、业务量增长等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农民尤其是创业农民除投入自家劳动力外,亦会适时采取短期或长期雇佣劳动力决策,以实现部分生产和服务环节的外包,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运转。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尤其是创业农民,对是否雇工经营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计算越精确,在支付合理工资以

雇佣劳动力扩大投资方面的决策越理性。当雇佣劳动力有助于减少损失和机会成本，规避更多创业风险和增加更多创业收益时，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越有可能成为有雇佣劳动力的创业者。因此，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民劳动雇佣决策的实施，推动劳动力需求市场发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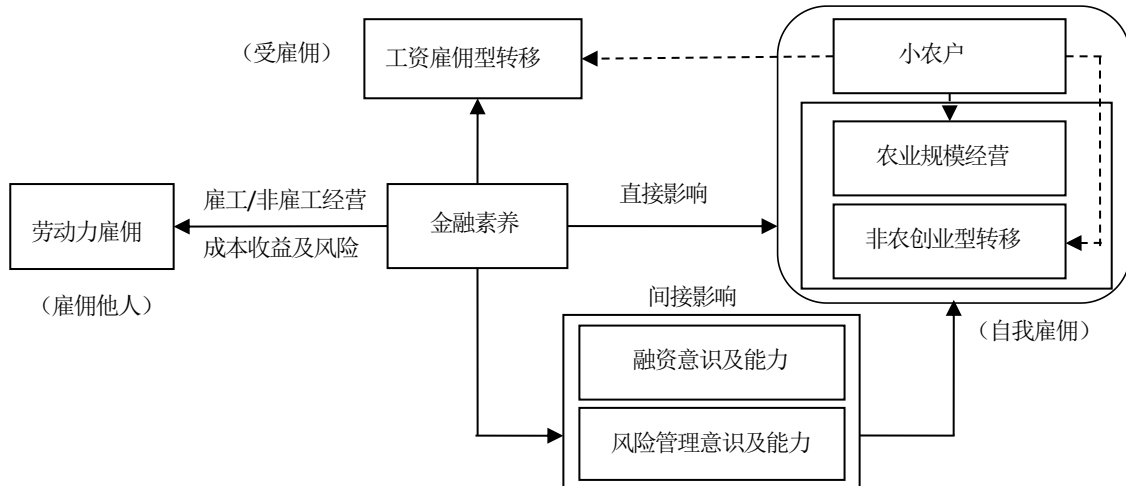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调查样本中创业农民<sup>①</sup>和非创业农民的比例分别为 46.57%和 53.43%，其中，农民存在涉农创业、非农创业行为的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30.49%和 16.83%；创业农民中存在短期和长期雇佣劳动力<sup>②</sup>的比例分别为 50.33%和 28.78%，且短期雇佣和长期雇佣劳动力数量均值分别为 12 人和 3 人。本文以通货膨胀、储蓄、贷款、信用、风险五个方面题项<sup>③</sup>测量农民金融素养水平，采取得分法进行赋值（即单个题项回答正确得 1 分，否则得 0 分）。结果显示，样本金融素养得分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均值为 2.80，标准差为 1.20，且得分为 3 及以下的比例为 70.04%。将样本金融素养水平按低于（等于）均值、高于均值划分为低金融素养组和高金融素养组。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 1）表明，农民金融素养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创业行为、涉农与非农创业行为、短期及长期雇佣劳动力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 1）结果表明，创业行为和创业

<sup>①</sup>农民创业范畴界定如下：①涉农创业指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渔业等传统农业领域实施规模经营、开展新业务和建立新组织等涉农经济活动；②非农创业指在工商业领域开展商业流通、从事三产服务、创办企业等非农经济活动。

<sup>②</sup>短期雇佣反映不具有稳定性的雇佣关系，如临时工、短期工等，多以日为单位进行劳动报酬的核算；长期雇佣反映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雇佣关系，多表现为全年雇佣，且以月为单位进行劳动报酬的核算。

<sup>③</sup>金融素养测量题项：①通货膨胀产生后，同样 100 元钞票能买到的东西与现在相比如何？选项包括不知道、变多了、一样、变少了；②假设您将 100 元钱定期储蓄三年且期间不支取，若三年定期储蓄的年利率是 3%，三年到期后您能取出多少钱？选项包括算不出来、103 元、106 元、109 元；③若某人向银行贷了笔 30 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为 10 年时每月需还款额高于贷款期限为 20 年时每月需还款额，则哪种贷款总利息支出更低？选项包括不知道、20 年期、10 年期；④某人在 A 银行有贷款不良信用记录会对其在 B 银行申请贷款产生不利影响，您是否同意？选项包括不知道、不同意、同意；⑤您是否同意“购买一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风险要比购买单一股票的风险低”？选项包括不知道、不同意、同意。

农民劳动力雇佣行为在不同金融素养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即金融素养高的农民涉农创业和非农创业行为、创业农民短期和长期雇佣劳动力行为的发生概率更高。

表 1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劳动力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创业型就业			劳动力雇佣	
		创业行为	涉农创业行为	非农创业行为	短期雇佣	长期雇佣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32***	0.20***	0.20***	0.10***	0.23***
均值比较	低金融素养组	0.29	0.20	0.09	0.31	0.16
	高金融素养组	0.58	0.37	0.22	0.42	0.33
	差异	0.29***	0.17***	0.13***	0.11**	0.16***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617	61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

## （二）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当前农村土地产权交易的重要表现形式。诸多研究基于机会成本理论（罗必良、郑燕丽，2012）、劳动力迁移理论（陈飞、翟伟娟，2015）和交易费用理论（冀县卿等，2015）等不同视角解析农民农地流转决策的机理，但鲜有研究关注金融素养与农民农地产权交易行为的内在关联。鉴于农民土地转出和转入交易行为分别反映农民以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身份参与土地要素流动，且土地转出和转入行为的诱因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本文立足农民理性经济人假设，阐释供需视角下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转出和转入交易的影响机理（如图 2 所示）。

1.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转出交易的影响机理分析。一方面，投资理财知识丰富的农民，对保有农地的机会成本（农地转出租金）、农业与非农经营比较收益、农地转出引致的潜在失地风险等有较清晰的衡量和判断，因而倾向于在保有农地或转出农地获取租金，抑或从事非农就业等决策之间进行博弈并作出理性选择，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成本及风险最小化。因而，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出交易。进一步分析可知，短期内农地专用型资产不改变条件下，农民难以随意变更农地投资类型，保留原有农地的经营收入等农地转出的机会成本较为明确，且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内农地转出的平均租金水平变化较小，货币或实物形式的租金等农地转出的预期收益较为明确。此外，农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和流转合同保护，潜在失地风险等农地转出的风险较小。因此，总体上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确性程度较高，金融素养有助于农民作出理性的农地转出决策。另外，考虑到不确定性情境下农民理性经济决策还受到其风险偏好的影响，且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偏好发挥的作用越大，因而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关系中，风险偏好对农民农地转出交易的影响可能较弱。另一方面，储蓄、信贷、风险、信用等金融知识较全面的农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较多的非农就业选择及相应较高的预期工资水平，转出农地从事非农经营的倾向性更强；加之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关于农地流转的交易缔约能力较强，有利于降低讨价还价、契约执行等交易费用，促进农地转出交易。因此，金融素养亦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出交易。总之，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路



径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理性决策，有助于农地供给市场的发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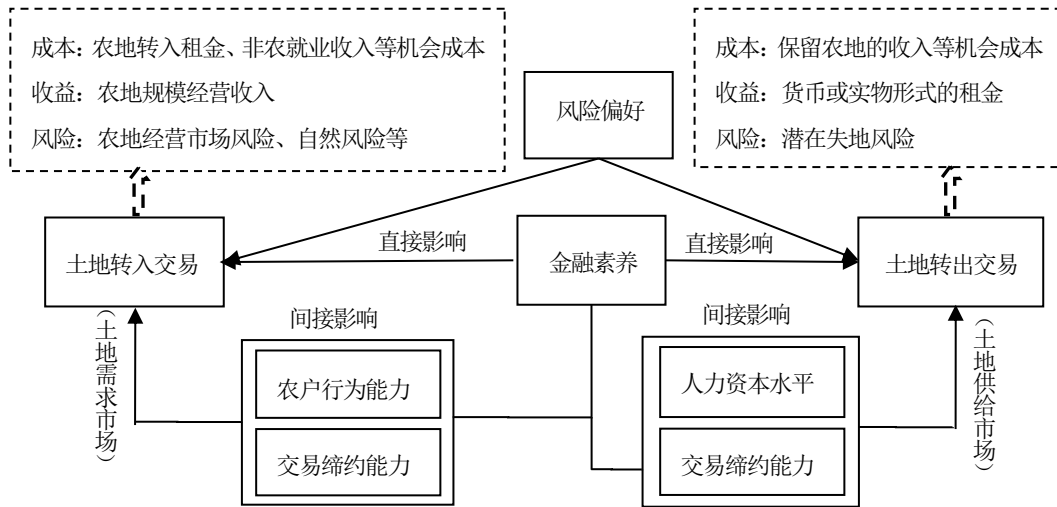


图2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2.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土地转入交易的影响机理分析。一方面，金融素养高的农民能清晰计算从事农业和非农经营的成本及收益，尤其能理性衡量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机会成本和专业化经营的规模效益，并充分认知转入农地从事规模经营的风险；当转入农地相较于维持现有经营规模可获取更多收益时，农民倾向于转入农地。因此，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转入交易。进一步分析可知，因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区域内农地转入的平均租金水平较为固定，而其非农就业收入等机会成本则不确定；且农地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农地转入风险较大，加之农地转入的收益（主要指农地经营收入）因受农地经营风险等影响而难以准确估算，因此，总体上农民农地转入交易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此外，鉴于风险偏好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对个体理性经济决策发挥较大作用，除考虑金融素养的影响外，风险偏好型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大的农地转入决策。另一方面，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关于生产资金获取、财务收支管理等技能越好，因而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行为能力越强；加之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交易能力尤其是议价能力越强，能降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成本，促进农地转入频率和转入规模的提高。因此，金融素养亦对农民农地转入交易产生间接影响。总之，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影响农民农地转入的理性决策，有助于农地需求市场的发育。

调查样本农户2017年参与农地转入交易和农地转出交易的比例分别为60.82%和20.15%，平均交易量分别为7.26亩和1.42亩，这表明陕西和宁夏农村地区农地流转交易虽整体较为活跃，但平均交易规模较小。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2）显示，金融素养与农民有无农地转入交易及交易规模、有无农地转出交易及交易规模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土地要素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2）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和转入交易行为在不同金融素养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即高金融素养组农民参与土地转出交易的概率及转出规模、参与土地转入交易的概率及转入规模均显著高于低金融素养组。

表2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土地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土地转出交易		土地转入交易	
		有无土地转出	土地转出规模	有无土地转入	土地转入规模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03*	0.01*	0.18***	0.15***
均值比较	低金融素养组	0.12	1.03	0.15	4.91
	高金融素养组	0.24	2.36	0.29	47.19
	差异	0.12**	1.33*	0.14**	42.28***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132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

### （三）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

传统金融市场和新型金融市场并存发展是当前中国农村资本市场的典型特征。以信用、担保等方式为主的农村传统资本借贷因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性较高，加之现有征信体系发展滞后等原因，难以对缓解农民融资难问题发挥长效作用。为突破农民有效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以下简称农地抵押）贷款在全国232个县区得以试点和推广，同时也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此外，互联网金融正在积极向农村地区渗透，为农村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但受制于农村软硬件环境，中国农民面临严重的互联网金融排斥，且互联网储蓄排斥和信贷排斥的比例高于互联网支付排斥（何婧等，2017）。鉴于农民金融素养在农村传统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已得到学界共识，本文重点探究农民金融素养对以农地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市场为典型代表的农村新型资本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如图3所示）。

1.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传统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大量研究证实，金融素养显著影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传统信贷行为，并体现在个体信贷需求、信贷产品选择、信贷成本及信贷合约执行等方面。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家庭表现出更高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参与积极性，其正规信贷约束较低且信贷质量整体较高（Davidson, 2002）。提高个体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增强其对借贷条款、金融市场风险与责任等的理解，促使其在信贷渠道和信贷产品选择方面实现低成本决策（Gathergood, 2012）。另有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高的消费者理性借贷及按期足额还款的概率更高（Sevim et al., 2012）。农民是农村资本要素市场的主要需求者，但同时部分农民以资金供给者身份开展无息、低息或高息等不同形式的民间放贷。农民是否参与私人放贷既受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制约，但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情关系。上述研究为探讨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的关联关系提供诸多有益借鉴。

2.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分析。从农地金融市场层面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及家庭特征、土地特征、抵押风险、抵押程序及价值评估等方面探究农民农地抵押贷款响应行为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关注农民金融素养对其农地抵押融资交易参与决策的作用。不考虑农地抵押贷款供给约束时，金融素养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行为。一方面，农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对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等各类贷款条款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越好，对不同融资渠道所需投入的成本、可能产生的收益及预期可得性的评估越理性，当农地抵押

融资相较于农民可触及的其他融资渠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需求更易满足时，农民将优先选择农地抵押贷款，即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决策。另一方面，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民，对农地抵押贷款申请及办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信用风险和农地被处置风险等的感知和识别能力较好，农地抵押风险承受能力和规避能力较强；同时，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民能更高效地搜寻和处理农地抵押贷款相关信息，更好地熟悉和把握农地抵押贷款政策及流程，参与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申请和办理能力更强，即金融素养间接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及参与决策。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已证实，金融素养显著促进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且农地抵押贷款供给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正向作用（苏岚岚等，2017），但金融素养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程度、资金利用及其效果等方面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此外，随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农地金融的深入发展，农地证券化、农地信托、农地入股合作社等新型农地流转融资模式将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得以推广和实践，因而，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益于农地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

从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层面看，互联网金融因具有跨越时空、对象均等特征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开拓有赖于农民互联网素养和金融素养的协同提升。随着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知识培训的日趋专业化，农民互联网素养的整体水平得以较快提高，而其金融素养的提升相对滞后，因此，金融素养水平偏低仍是制约农民互联网金融参与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原因。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对互联网支付（包括使用微信、支付宝、财付通等进行支付）、互联网理财（包括使用余额宝等储蓄产品及采用理财 App 购买保险、证券或基金等产品）、互联网借贷（包括使用 P2P、京东贷、旺农贷、花呗等）及互联网众筹（包括使用人人投、众筹客等股权型众筹以及轻松筹、水滴筹等公益型众筹）等的成本、收益及风险有较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直接影响其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的参与决策。同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农民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能力越强，更容易完成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能更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风险和维护自身的金融权益，更大限度获取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收益。此外，随着农民互联网金融思维的逐步形成，少量农民以资金供给者身份积极参与网上投资理财和平台放贷，并将其作为获取利息等财产性收入的新渠道，体现了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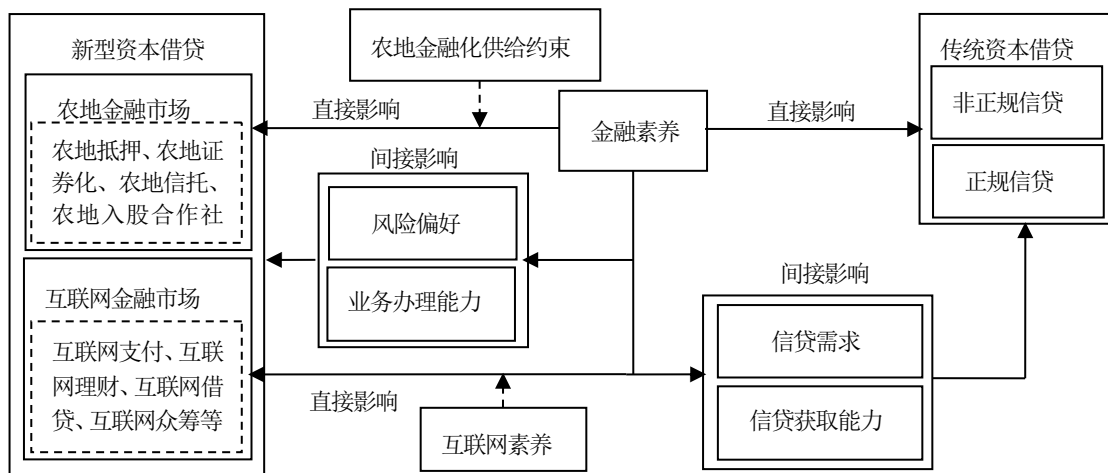


图3 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机理

调查样本农户 2015~2017 年获得过非正规信贷、正规信贷（农地抵押贷款除外）、农地抵押贷款的比例分别为 43.25%、38.26%和 28.75%，且相应的均值分别为 5.14 万元、17.16 万元和 3.62 万元；样本农民使用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及互联网众筹的比例分别为 64.36%、9.77%、6.31%和 17.63%。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证实，金融素养对缓解农民信贷约束、增强农民融资可得性、促进农民农地抵押贷款行为响应等具有显著作用。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 3）结果显示，农民金融素养与其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互联网众筹等使用行为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的组间差异性比较（见表 3）结果表明，农民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借贷和互联网众筹的使用在不同金融素养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民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概率更高。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及不同金融素养组样本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组间差异性

		互联网支付	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借贷	互联网众筹
相关系数	金融素养	0.40***	0.23***	0.21***	0.16***
均值比较	低金融素养组	0.43	0.02	0.01	0.11
	高金融素养组	0.79	0.15	0.10	0.22
	差异	0.35***	0.13***	0.09***	0.11***
样本量		1325	1325	1325	132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组间差异性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

#### 四、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雇佣归结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即“人动”），将土地市场中的土地转出交易和转入交易归结为土地要素的流动（即“地动”），将资本市场中传统资本借贷和新型资本借贷归结为资金要素的流动（即“钱动”），以系统探究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整合。诸多研究证实，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的流动具有两两关联性特征。如农民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胡新艳等，2017），非农就业尤其是非农创业显著促进农民正规信贷参与（米运生等，2017），而正规及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创业（刘雨松、钱文荣，2018）；农地转入与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胡新艳等，2017），且农地转出促进农民职业非农化并显著增强其信贷需求及信贷可得性（米运生等，2017），而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民农地转入及转入规模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许泉等，2016）。鉴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之间存在内在互动逻辑，并且金融素养从不同层面影响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发育，本文试图进一步构建动态视角下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如图 4 所示），阐释其局部关联机理，并剖析其整体运行逻辑，以期以农民金融素养为支点撬动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整合发展。

1. 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人动—地动”的互动关联。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雇佣型或自主创业型流动，并推动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交易。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

提高通过作用于“人动”进而影响“地动”，亦通过作用于“地动”进而影响“人动”。具体表现为：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其就业选择能力较强，工资雇佣型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倾向性更高。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雇佣型转移、农业和非农领域的自主创业等生计选择均影响农民对农地的依赖性和价值认知，农业领域内创业对规模经营的需求促进农民农地转入交易，而非农创业对农地的排斥性一定程度上引致农民农地转出交易。同理，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参与农地资产配置和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的能力较强，可通过农地转入实现农业领域内创业，也可通过农地转出获取财产性收益或解除非农就业的农地牵连进而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此外，农民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要素流动可增强其资产配置能力、财务规划能力和现金管理能力等，进而促进其内在金融素养的累积。

2.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人动—钱动”的互动关联。一方面，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增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自由度和参与程度，并同时影响其资本市场参与决策。另一方面，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通过影响“人动”间接作用于“钱动”，亦通过影响“钱动”间接作用于“人动”。具体表现为：农民金融素养的提升有益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农民工资雇佣型和自主创业型转移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资金需求，前者用以满足工作搜寻、稳定居所等需要，后者则用以满足扩大规模、雇佣劳动力或开展新业务等初始创业资金或周转资金的需要。因而，农村劳动力不同的流动形式对农民传统金融市场或新型金融市场的参与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理，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在资本市场上获取借贷资金的能力越强，进而增加其就业选择的自由度尤其是增加其农业和非农领域创业的概率，提升其对资金门槛较高行业的进入能力。此外，农民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要素流动亦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农民金融素养的提升。

3.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要素市场“地动—钱动”的互动关联。如前所述，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可促进其土地流转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单一市场参与。进一步地，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通过促进“地动”进而推动“钱动”，亦可通过促进“钱动”进而推动“地动”。具体表现为：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决策更显理性。农地转入需要支付一定的租金，且需投入相应的农地生产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信贷需求，促进其资本要素市场参与；而农地转出使农民获得相应的农地流转收益，有助于缓解农民资金约束，但同时农地转出促使农民选择门槛相对较高的非农行业就业，进而产生更强烈的信贷市场参与需求。因此，农地产权交易参与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金融需求及其规模。同理，金融素养高的农民在参与资本市场、获取借贷资金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其转入农地开展规模化经营或转出农地实现非农就业转移。此外，如前所述，农民在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中的多样化参与实践有益于提高其金融素养水平。

4.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运行逻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既促进农民以要素需求者身份积极参与农村各要素资源的获取，也推动其以要素供给者身份主动参与农村各要素资源的供给。农村要素市场各主体以多样化的要素供需参与实践助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充分有序流动，同时，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协同成长及紧密关联加速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匹配发展。因此，农民金融素养的纽带作用在于通过激发农村要素市场各主体参与要素供需的能动性，最大限度激

活农村各要素市场的循环关联系统，并在参与要素流动的实践中得以持续提升，不断生成要素流动新的循环，最终促进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整合发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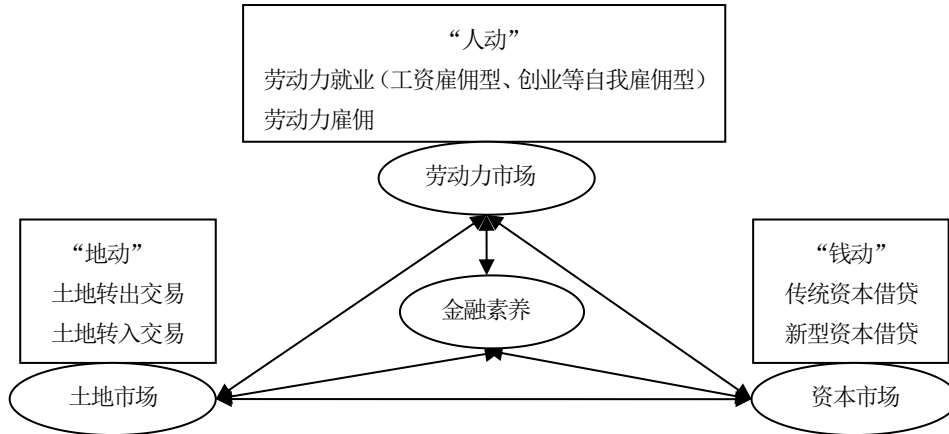


图4 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系统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素养理论研究的演进，立足农村需求侧，从金融素养视角切入，系统探究了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整合的互动关联机理。随着金融素养研究扎实推进和中国农村要素市场化加快发展，创新性拓展金融素养理论研究视域和研究框架，尤其是从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层面深入挖掘农民金融素养对农村经济福祉的影响应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均存在内在联结关系，且农民金融素养在农村三大要素市场互动关联系统中发挥重要纽带作用，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村各单一要素市场的发育，而且有益于推动农村各要素市场均衡匹配发展，促进“人动—地动—钱动”的要素市场互动关联系统的形成和完善。

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以加快农村要素市场整合发育、有力支撑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有益思考和政策启示。一是推进农村要素市场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应从需求侧发力，多渠道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其三大要素市场参与能力和参与程度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增加金融知识课程教育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的比重，推动高校、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金融知识培训，搭建和利用以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手段为依托的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传播金融信息，不断拓展农民金融知识积累渠道；鼓励银行或信用社就近开展金融业务办理模拟培训活动，将金融知识教育融入到实务操作之中，增强农民金融业务办理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利用能力；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农民自主学习金融知识、重视提高金融技能、主动利用金融服务生产生活的良好氛围，强化农民金融意识。二是应协调推进“人动—地动—钱动”，促进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均衡发展和良性互动，激活市场和主体，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实现多重政策效应的叠加和强化。构建“人动—地动”的互动机制，既促进劳动力由工资雇佣型流动转向门槛较高、增收空间较大的自主创业型流动，也支持农地产权交

易市场的制度完善和各类中介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推动农地规模化经营;构建“人动—钱动”的互动机制,既鼓励劳动力创业型就业,也支持创业型资本借贷市场发展,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服务于劳动力就业,尤其应支持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以有效匹配劳动力市场不同类型劳动力要素流动所产生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构建“地动—钱动”的互动机制,既撬动农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也促进农地资本化和农地金融的深化,实现农地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协同发展。

#### 参考文献

- 1.陈飞、翟伟娟,2015:《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 2.侯明利,2013:《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的耦合协调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0期。
- 3.胡振、臧日宏,2017:《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影响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证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4.胡新艳、洪炜杰、王梦婷、罗必良,2017:《中国农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联逻辑——基于农户多要素联合决策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1期。
- 5.何婧、田雅群、刘甜、李庆海,2017:《互联网金融离农户有多远——欠发达地区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及影响因素分析》,《财贸经济》第11期。
- 6.冀县卿、钱忠好、葛铁凡,2015:《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江海学刊》第2期。
- 7.罗必良、郑燕丽,2012:《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学术研究》第7期。
- 8.刘西川、陈立辉、杨奇明,2014:《农户正规信贷需求与利率——基于Tobit III模型的经验考察》,《管理世界》第3期。
- 9.刘雨松、钱文荣,2018:《正规、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的视角》,《经济经纬》第2期。
- 10.米运生、曾泽莹、高亚佳,2017:《农地转出、信贷可得性与农户融资模式的正规化》,《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 11.秦芳、王文春、何金财,2016:《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10期。
- 12.宋全云、吴雨、尹志超,2017:《金融知识视角下的家庭信贷行为研究》,《金融研究》第6期。
- 13.孙光林、李庆海、李成友,2017:《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知识对信贷违约的影响——以新疆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14.苏岚岚、何学松、孔荣,2017:《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基于农民分化、农地确权颁证的调节效应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15.吴雨、彭嫦燕、尹志超,2016:《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当代经济科学》第4期。
- 16.吴雨、宋全云、尹志超,2016:《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和信贷渠道偏好分析——基于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视角的解释》,《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 17.王正位、邓颖惠、廖理,2016:《知识改变命运:金融知识与微观收入流动性》,《金融研究》第12期。

- 18.王宇熹、范洁, 2015:《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第3期。
- 19.魏昭、宋全云, 2016:《互联网金融下家庭资产配置》,《财经科学》第7期。
- 20.许恒周, 2011:《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管理》第9期。
- 21.许恒周、金晶, 2011:《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对农民养老保障模式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资源科学》第8期。
- 22.许泉、张龙耀、吴比, 2016:《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3.尹志超、宋全云、吴雨, 2014:《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经济研究》第4期。
- 24.尹志超、宋全云、吴雨、彭嫦燕, 2015:《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管理世界》第1期。
- 25.张欢欢、熊学萍, 2017:《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26.曾志耕、何青、吴雨、尹志超, 2015:《金融知识与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经济学家》第6期。
- 27.朱文珏、罗必良, 2016:《行为能力、要素匹配与规模农户生成——基于全国农户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学术研究》第8期。
- 28.张号栋、尹志超, 2016:《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7期。
- 29.张龙耀、王梦珺、刘俊杰, 2015:《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与微观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 30.Anderson, A., F. Baker, and D. T. Robinson, 2017, "Precautionary Savings, Retirement Planning and Misperceptions of Financial Literac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6(2):383-398.
- 31.Agarwal, S., G. Amromin, I. Ben-David, S. Chomsisengphet, and D. D. Evanoff, 2015,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Planning: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7: 4-21.
- 32.Chen, H., and R. P. Volpe, 1998,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 7(2):107-128.
- 33.Cutler, N. E., and S. J. Devlin, 1996, "Financial Literacy 200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U & CHFC*, 50(4):32-37.
- 34.Davidson, S., 2002, "Take the Long Outlook on Credit Qual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Community Banker*, 11(5):40-42.
- 35.Dohmen, T., A. Falk, D. Huffman, and U. Sunde, 2010,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1238-1260.
- 36.Gathergood, J., 2012, "Self-contro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Consumer Over-indebted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3):590-602.



- 37.Hastings, J. S., and O. S. Mitchell, 2011, “Ho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mpatience Shape Retirement Wealth and Investment Behavio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6740, <http://www.nber.org/papers/w16740>.
- 38.Huston, S. J., 2010,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296-316.
- 39.Lusardi, A., O. S. Mitchell, and V. Curto, 2010,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the Young: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umer Policy”,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44(2): 358-380.
- 40.Mason, C. L. J., and R. Wilson, 2000, “Conceptualizing Financial Literac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 41.Noctor, M., S. Stoney, and R. Stradling, 1992, “Financial Literacy”.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Research, London.
- 42.Sevim, N., F. Temizel, and S. Özlem, 2012,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Borrowing Behaviour of Turkish Financial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36(5):573-579.
- 43.Servon, L. J., and R. Kaestner, 2008, “Consume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Impact of Online Banking on the Financial Behavior of Lower-income Bank Customer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2(2):271-305.
- 44.Walstad, W .B., K .Rebeck, and R. A . MacDonald, 2010,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on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4(2): 336-357.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曙光)

##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Su Lanlan Kong Rong

**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would encourag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factors market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logic,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literacy. The study interprets the intern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explores and constructs the interaction system between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hree major factors markets, labor, land and capital market from dynamic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local and overall operation logic of this system. This study finds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can help them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factors market as both factors demanders and suppliers, and promote the full flow of labor, land, capital and other el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factor marke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aking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as the linkage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interaction system of rural factors market.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practice of factors flow and the constant generation of new cycles of factors flow at the same time. As a result, the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rural factors markets will eventually be realized.

**Key Words:**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Rural Factors Market; Interaction Mechanism